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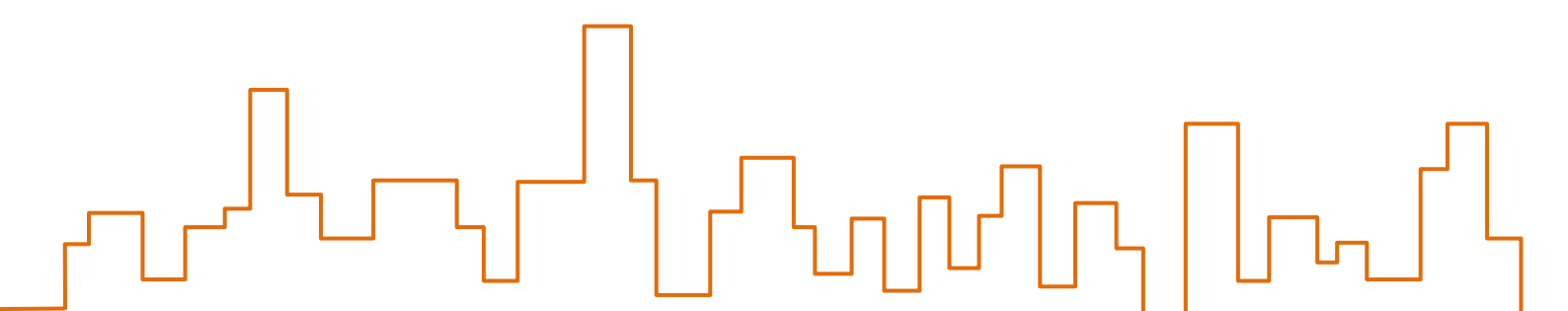
成都浦江县调研报告

——基础教育撤并的灵活处置推进基础 教育资源的新作用

李煜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ity and competitiveness (CASS)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空间布局本质上教育优质资源的均衡布局问题，其根源在于教育机构空间布局与人口流动之间的矛盾，同样也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即优质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区，以至于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城区。在城镇化进程中，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农村、乡镇中小学师资过剩与师资结构性不足共存，教师平均年龄过高、学历水平较低，农民抵制学校撤并，学校日常管理问题等等。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基础教育空间布局对教育公共品提供上的影响，尤其是学校撤并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邬志辉，史宁中，2012），实际上，一刀切的撤并政策几乎必然带来对区域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上的不利影响（汪冬梅，2013），但是撤点并校形成的空间变迁是不是仅仅带来负面影响呢？就我们本次在成都浦江县的调研上看，当处置手段较为灵活时，空间布局变迁可以产生额外的正效应。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在关注农村中小学空间布局变迁时，研究者的注意力更多集中于空间布局变化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影响，以及对空间布局变迁的改进方法的研究上。就前者而言，基础教育机构空间布局变化至少在短期内对教育过程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例如，教育机构空间布局调整形成的教育空间变化带来的受教育意愿、学生心理的变化，在短期内，部分学生辍学，区域内不同地区学生混合带来管理难题¹，同时学校集中于城区导致学校学生数量膨胀，给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带来众多困难（邬志辉，史宁中，2011；于海洪，2012）。此外，根据雷万鹏（2012）对我国 11 省的调研结论，基础教育空间布局的调整对家庭教育多样化需求也存在负面影响，总体来看基础教育空间布局的调整对教育效益、社会效益等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²。尽管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提到了由于一刀切的撤并政策带来的学校规模不均衡，但是指出了我们在浦江调研时看到的乡镇学校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但是鲜有研究去提到基础教育机构灵活处置现有教育资源的案例，这使得我们对浦江教育的调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成都浦江县是成都的边远县，按照成都规划属于其“三圈城”范畴，该地区农业较为发达，而工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县域内环境优美，地均人口密度低，所以撤并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镇一级学校仍然存在教育资源结构性短缺和整体

¹ 该变化是根据贺新向（2007），方娟（2012），刘碧滢（2012）的三篇硕士论文中的调研资料得出。

² 对效益的论述研究者更多从定性方面进行了探讨，例如凡勇昆，邬志辉（2013）；邬志辉，史宁中（2012）等对教育机构布局调整方式、政策对教育效益及社会效益的影响

性冗余的矛盾。蒲江教育的创新之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将社区学校和义务教育学校合二为一，义务教育学校的校长兼任社区学校的校长；其二是利用义务教育资源推进社区教育，蒲江称之为“推到学校围墙”，不妨以成佳学校为例具体言之。

成佳学校位于蒲江县成佳镇，目前以茶叶种植、制造为主要产业。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前较为知名的成佳“雀舌”并不是其原生品种，早期的茶叶质量并不能达到市场要求，就企业而言，在茶农中大范围推广新品种交易费用过大。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义务教育机构的成佳学校在育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成佳茶叶发展初期，成佳学校成为企业和茶农之间的联系人。根据访谈，其具体过程可以简单描述。由于社区教育的职责，成佳校长找到茶企，希望茶企能够帮助成佳社区学校对茶农进行培训。由于本身与义务教育学校是一体的，成佳学校可以利用其对学生家长的影响降低培训教育的召集费用，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几乎为零，由于茶农很快就在培训中发现相关培训可能大幅度提高其收入，所以茶农开始主动要求栽植新品种，其结果是企业与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得到极大的降低，新的茶树很快被推广，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对茶农在栽培、采摘、炒制等方面的培训费用。在此基础上，成佳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推进茶文化教育，将其引入义务教育，提高了义务教育的多样化。总体来看，正是成佳学校的参与下，通过促进企业和茶农的联系，进而形成企业、茶农（家庭）、社区、教育四方的密切联系，以此降低企业与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推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就访谈结果分析，成佳学校能够在本地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一是政策上的，由于义务教育学校校长兼任社区学校校长，使得校长有动机灵活利用义务教育资源（主要是家长和校舍）的动机和权利；其二是本地环境，成佳本地学生少，义务教育负担较轻，同时本地自然条件优越，有种植经济作物的条件；其三是成佳学校校长以及蒲江教育系统主动创新意识较强，在实地调研和访谈中我们发现，成佳学校仅是蒲江社区教育的一个方面，蒲江社区教育在培训方式、培训内容方面均有创新之处。

当然，受调研时间及调研者水平限制，本次调研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受调研时间限制，本次调研并不能充分了解蒲江县教育的全部特点；其二，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并不能对蒲江社区教育的效果进行全面说明，特别是社区教育与义务教育放置于同一机构是否对义务教育产生不良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

取得更为直接的证据；其三，受访谈本身局限性的影响以及缺少更多一手资料，我们对蒲江教育实际发展过程仍然缺少足够深入的了解，这使得本次调研的发现的一般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缺失，这妨碍了将其用于推广的。尽管如此，蒲江教育在结合本地特殊情况灵活运用教育资源从而促进城镇化推进的做法及经验仍然极具借鉴意义，借用蒲江教育局推出的“大教育”理念，不再固守各级教育传统职能，因地制宜的将各级各类教育相结合将是城镇化推进中非常重要的助力和保障。

刘碧滢（2012），《城乡统筹背景下陕西县域中小学校空间计划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硕士论文

贺新向（2007），《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硕士论文

方娟（2012），《靖边县农民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认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硕士论文

凡勇昆，邬志辉（2013），《论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教育研究》，2013.7

邬志辉，史宁中（2011），《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十年走势与政策议题》，《教育研究》，2011.7

汪冬梅（2013），《十年农村地区中小学撤点并校:审视与反思》，《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3.3

于海洪，《从实求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方法论》，《教育政策研究》，2012.10

雷万鹏，《家庭教育需求的差异化与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6